

组织知识创造中默会知识问题

芮夕捷¹,程波²

(1. 长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2. 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财务资产处,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组织知识创造研究强调默会知识向显式知识转变的核心环节,然而这一环节的前提是默会知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以柏拉图的学习即回忆说为切入点,认为默会知识有分析性和综合性两种,分析性默会知识向显式知识的转变本质上是将蕴涵于相关显式知识之中而又不为意识所意识到的知识发掘出来,而综合性默会知识向显式知识的转变本质上是认知主体在其显式知识结构中寻找与主题相关的知识与推演规则,并据此推演出相应的默会知识。组织知识创造所涉及到的默会知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能转变为显式知识。

关键词:组织知识创造;默会知识;知识论;显式知识

中图分类号:C93-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1-0048-04

在管理领域内,组织知识创造是知识管理或知识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组织知识创造研究始于野中郁次郎及其团队的研究工作。自野中郁次郎1991~1995年发表一系列有着组织知识创造的论文及著作至今不过20年时间^[1-3],其间产生了大量知识创造的研究文献。组织知识创造的SECI模型目前已成为组织知识管理领域中的经典模型,不仅被大量的研究广泛引用,而且也得到企业的普遍应用^[4]。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以SECI模型为基础,或对其进行分析性研究与说明,或将其应用于某些领域组织知识创造的研究,或对其作出进一步的补充性研究与说明^[5-10]。但从管理哲学的层面来看,野中郁次郎提出组织知识创造的基本理论及相应的SECI模型和其随后的研究文献都表明,对组织知识是如何创造出来的问题的论证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一、组织知识创造的知识论问题

野中郁次郎提出组织创造的基本理论及SECI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在不同的组织规模(本体论维度)上,显式知识(Explicit knowledge)与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通过社会化(S)、外化(E)、联结化(C)、内化(I)4种模式相继转换(认识论维度),实现组织知识创造。SECI模型明确表示:“个体的默会知识是组织知识创造的基础,组织需要调动由个体所创造及积累的默会知识。被调动出来的默会知识,通过知识转换的4种模式‘在组织层次上’得以放大,并且在存在论维度较高层次上结晶下来。”^[3]这个过程被称为“知识创造的螺旋”。

野中郁次郎认为“在知识转换的4种模式中,因为外化(Externalization)是从默会知识中创造出新的形式概念,所以它对知识创造是至关重要”,

“是知识创造过程的精髓”^[3]。所以从 SECI 模型视角看,默会知识能否转换为显式知识,是组织知识创造是否可能的重大问题。但它涉及到两个进一步问题:一是默会知识是否能够转化为显式知识问题,二是默会知识又是如何可能的问题。有关第一个问题,有些学者认为默会知识是不能转化为显式知识的^[11-12],或只有部分默会知识能转化为显式知识^[12]。有关第二个问题,组织知识创造的研究传统中仍未见有相关的论述。这两个问题都是组织知识创造的知识论基础问题,且第二个问题更为基本,它决定着第一个问题的解决。

对于默会知识如何可能的一种回答是:采取柏拉图对于新知识获取的方式,即认为新知识的获取是个人不断努力回忆的结果^[13]。

二、柏拉图的学习即回忆理论

柏拉图在其著作《美诺篇》中为新知识获取提供了一个学习理论,其要点是人们在学会任何东西之前,它已经存在于人们的心灵中,只是它没有为人们所意识。学习即是将其从不被意识的状态转化进入意识,成为人们的所知(即知识)。这种学习的过程被称为回忆,它是新知识获取的努力过程。

为了说明这种新知识获取方式的合理性,柏拉图在《美诺篇》中借助苏格拉底和美诺的僮奴不断对话的实验方式(僮奴实验),对话是在苏格拉底确认僮奴具有正方形和面积概念的前提下,围绕如何作面积两倍于原正方形的一个新正方形问题展开的。针对此问题,僮奴开始很自信地认为将原正方形的边长扩大一倍即可,但在苏格拉底的追问下僮奴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僮奴第二次提出新的见解,即将正方形的边长延长一半。但很快僮奴又意识到,按自己的见解所形成的新正方形的面积是原正方形面积的两倍多。此时,苏格拉底提请美诺注意,遵照只问不教的原则,僮奴在苏格拉底的不断追问下最终知道如何作出一个面积两倍于原正方形的正方形,据此发现了以前不曾知晓的几何定理。苏格拉底总结为:“尽管我只是问他问题而不教他,通过与我一起寻找,他将发现真理。”柏拉图借助于苏格拉底与美诺的对话,说明了任何所谓新的知识,其实在它为人们为之有所认知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人们的心灵中,认知(新知识的发现或获取)只不过就是将其从不为人们所意识的状态转变为意识的状态。学习即回忆,学会知识就是成功地回忆起了先

前已经存在于心灵中的东西。

至此,可以认为柏拉图的学习即回忆与组织知识创造过程中最为关键的默会知识向显式知识转化是一致的。然而柏拉图对原先就存在于人们心灵中,而又不为人们所认知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解释带有明显的先天色彩,令人无法接受。柏拉图认为,世界有两个,人的灵魂是不朽的。不朽的灵魂在某一时刻到达某个端点即死亡,而在另一点上再生。死亡只是灵魂离开肉体,而不是灵魂的消亡。灵魂在生前世界中直接观照事物的本质即事物的理念,故它已在生前就掌握了所有事物的真理,当灵魂来到现世时,它只是忘记了这些真理。现实中的人们,对事物的知识存在3种不同的状态:有知、无知和意见。当人们将其注意力集中于经验世界的具体事物时,他是不可能有什么知识可言的。因为具体事物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正如赫拉克里特所认为的那样,经验的世界是一个流变着的世界。对于变化世界事物的知识人们是无知的充其量只有意见。例如人们可以看到美的东西、善的东西,但看不到美本身和善本身。而正是类似这种有关事物的纯粹理念或形式才是事物的本质所在,对它们的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知识就是事物的绝对本质即理念,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美本身,正义等等本身”。这种有关事物纯粹的形式,即有关事物的知识,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回忆才有可能获得。

三、默会知识如何可能

《美诺篇》中僮奴所获取的新知识在其明确之前,虽然不能与当代组织知识创造研究传统中的默会知识完全等同,但它至少是属于默会知识的。柏拉图对僮奴实验带有先天性的解释虽不能接受,但僮奴实验本身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据此,关于默会知识如何可能及显式化的问题,可通过进一步分析僮奴实验其他可能的解释予以说明。

(一) 分析性默会知识

有关僮奴实验可能的解释之一可以从分析性知识与综合性知识的区别切入。公共的、可批判的知识总是可以用语言表达为命题或命题系统的知识,而命题则可以分为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两种。分析命题是指命题谓词的意义包含在命题主词的意义中,是将谓词的意义从主词中分析出来加以表述。数学中的逻辑主义学派就认为,所有的数学命题或知识都是分析命题。譬如,仅通过对“素数”和“数”

的概念进行分析,就可获得“在 1 到 10 之间有 4 个比 1 大的素数”知识;通过分析“直角三角形”和“圆”的几何概念就可以证明,以“圆的直径为斜边,从圆周上任意一点向直径两端作直线所形成的三角形为直角三角形”等等。柏拉图在《美诺篇》中的僮奴实验涉及的知识主题正是几何学,而且实验是在苏格拉底确认僮奴有(且仅有)“正方形”及其“面积”的知识后进行的。故可以认为“以一正方形对角线为边长的正方形,其面积是原正方形面积的 2 倍”的知识原本就存在于僮奴心灵中,实验过程即柏拉图所谓的“回忆”过程只不过是已经存在于僮奴那里而未被其心灵所明确意识到的东西发掘出来并加以表述而已。

(二) 综合性默会知识

但有关“正方形”及其“面积”本身是什么的知识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一问题本质上是有关僮奴实验的第二种可能的解释,即综合性知识如何获得的问题。所谓综合性知识是指由综合命题所表达的知识,综合命题即命题谓词的意义超出了主词的意义范围。原则上,综合命题必须由思维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对象的具体属性及关系,并以此获得命题(知识)。自然科学中以各种方式与某种经验相关联的命题都是综合命题,综合命题的正确性必须经由实验或实践的批判才能加以恰当判断。

组织知识创造所涉及的知识,基本上都是综合命题构成的知识。对于由综合命题构成的知识,有关僮奴实验的可能性仍可以加以合理解释。当僮奴获得新知识时,与其说这种知识早就存在于僮奴心灵中不过是说这种知识是“先于”其表述而存在的,这里的“先于”实质上指逻辑意义上的“先于”,逻辑在先不等于时间在先。故至少可以肯定,尽管僮奴所发现的新知识在逻辑上必须先于其表述而存在,但时间上这种新知识可以与其表述同时被意识到(同时存在于意识中)。因此僮奴发现知识的过程实际上是其在外部激励下开启由先前经验、知识等要素参与其中的思维的综合努力过程。

这种思维的综合努力过程本质上是调动存在于认知个体心灵中的相关知识,并按照有效的逻辑规则合理地将它们组合成用于推理的前提条件,以此有效地推演出解决当前问题的知识命题。需要说明的是,“认知个体心灵中的相关知识”有些是根据问题就明确的,有些则可能是不为认知个体所明确意识到的。这些知识可以按照什么样的方式组合成为推理的前提也是默会的。实际上,表述相同前提的

不同表达方式,要配以不同的推理规则都能推导出相同的知识命题。最后,通过前提和推理规则所推演出的、用以解决当下问题的知识命题更是默会的。它们虽然本质上蕴涵于前提条件中,但在运用适当的逻辑规则将它们推出之前,它们是完全不为认知个体所意识到的。

因此,这里依据认知个体先前所掌握的知识和相应的推理规则所推演出来的,用于解决问题的知识命题是属于默会性知识,而且是综合性的。实际上,这里用于认知个体推理前提的、沉淀于意识深处的相关知识及相应的推理规则等都是某种意义上的默会知识。

在思维的综合过程中,问题解决所需的各种元素都存在于心灵中。其中有的是为意识所明确意识到的要素,但也有未被意识所明确意识到的要素。这些构建问题解决方案所必需而又未被意识所明确意识到的要素是组织知识创造中默会知识的根源,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就是决定问题解决方案的形式统一性要素。思维中综合的努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寻找这种统一性要素,它或许隐藏在人们过去的经验、知识结构等其他要素中,或许隐藏在各种知识要素的前提中而处于潜意识或无意识中,它在思维中被称为知识的型。

如果《美诺篇》中僮奴实验所涉及的知识是综合性知识,则僮奴在寻求问题解决的思维的综合过程中试图要发现的东西正是这种知识的型。一旦这种解决问题的要素(知识的型)出现在意识中时,默会知识瞬间转变为显式知识。伴随问题解决的这种瞬间转变,在有的学者那里叫“直觉”,而在另一些学者那里叫“突现”。

(三) 默会知识与显式知识

默会知识向显式知识转换是组织知识创造的重要环节,也是本质性的环节。因此,组织知识创造所涉及到的默会知识,是能够转化为显式知识的默会知识。在这种显式知识中,既有分析性的默会知识,也有综合性的默会知识。除此之外,默会知识还有其他的类型。譬如,任何显式知识一般都有其成立的预设条件,这些预设的条件中至少有的通常不是(或不能)明确言述的,它们都是默会性知识。

一旦难以言述的默会知识通过认知个体的思维努力,转化为言述性的显式知识,则相关知识创造的核心过程就告完成。但默会知识到显式知识的转化过程并非易事,即使是分析性的默会知识也是如此。数学定理证明的艰难过程就足以说明,分析性的默

会知识转变为显式知识是极其困难的。蕴涵在认知者相关的综合性知识中的综合性默会知识,其转化为显式知识更是困难。

组织知识创造所涉及到的默会知识,要么是指蕴涵在认知主体(个体或群体)所掌握的显式知识中且不为认知主体所意识到的知识(分析性知识的情形),要么是指认知个体所掌握的显式知识结构中能够以某种适当的综合构建方式可以形成的潜在知识(综合性知识的情形)。除此之外,不受限定的默会知识可能还包含其他的存在方式。但就组织知识创造所涉及的默会知识而言,作为一种特定存在方式,它一定是可以转变为显式知识的,否则组织知识创造就无法实现。

四、结语

当代组织知识创造的研究都强调默会知识向显式知识的转变过程,然而这些研究都没有清楚阐明默会知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与此相关的问题还有:默会知识究竟能否转变为显式知识。这些问题都是组织知识创造的知识论基础中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任何组织知识创造研究都必须面对这两个问题。

这两个知识论基础问题深入探索的恰当切入点是柏拉图的学习即回忆的认知理论。从柏拉图的学习即回忆理论出发,默会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进一步分解为分析性默会知识与综合性默会知识分别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分析性默会知识是以认知主体所知的显式知识为前提,并通常以极为潜在的方式蕴涵于其中的知识,思维只有通过艰苦的努力才能从中发掘出这种默会知识并同时将其转变为显式知识。综合性默会知识是蕴涵于认知主体相关的知识(有些是默会性知识)和某种推演规则之中,而又不为主体所意识到的知识。认知主体为导出这种默会知识,需要其思维坚持不懈的努力,洞察相关的知识组合与推理。

在分析默会知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中已经包含了默会知识向显式知识转变以实现组织知识创造的断定。需要强调的是,默会知识可能有多种形式,这里只涉及组织知识创造中的默会知识到显式知识的转变问题。

作为完善的组织知识创造的知识论基础,综合性默会知识转变为显式知识的过程机理仍需深入探

索,较好的切入点是充分研究科学知识创造的研究文献,但利用科学创造研究文献的前提是确保科学知识创造与组织知识创造具有同样的机理。而这又进一步涉及到从知识创造的视角看,科学知识 with 组织知识有些什么相同与差异,科学发现的逻辑与组织知识发现的逻辑是否相同等问题。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还会进一步涉及到更为一般的理论问题。故探索组织知识创造过程机理以完善相应的知识论为基础,是一个复杂细致的工作,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Nonaka I.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1, 69(11/12): 96-104.
- [2] Nonaka I. A dynamic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4(2): 14-37.
- [3] Nonaka I, Takeuchi H.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4] 顾基发, 张玲玲. 知识管理[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 [5] 叶文伟, 范翠玲. 基于 SECI 模型对图书馆知识管理的探讨[J]. 情报杂志, 2008(5): 58-59, 63.
- [6] 李文华. 企业知识创新的路径[J]. 企业改革与管理, 2008(7): 32-33.
- [7] 牛亮云, 吴林海. 基于知识创造与知识转移的企业研发模式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08(2): 217-219.
- [8] Holmqvist M. Learning in imaginary organizations: creating interorganizational knowledge[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 1999, 12(5): 419-438.
- [9] 张明, 江旭, 高山行. 战略联盟中组织学习、知识创造与创新绩效的实证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08, 26(4): 868-873.
- [10] 彭灿, 胡厚宝. 知识联盟中的知识创造机制: BaS-C-SECI 模型[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8, 20(1): 118-122.
- [11] Cook S D N, Brown J S. Bridging epistemologies: the generative dance between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and organizational knowing[J]. Organizational Science, 1999, 10(4): 381-400.
- [12] Leonard D, Sensiper S. The role of tacit knowledge in group innovation[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98, 40(3): 112-132.
- [13] 芮夕捷. 管理决策中的知识创造[J].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16(3): 59-64.